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八年三月

宋代譯經制度新考 ——以宋代三部經錄為中心

馮國棟*

宋代編撰的三部佛教目錄，《大中祥符法寶錄》《天聖釋教總錄》《景祐新修法寶錄》詳細記述了宋代譯場的設立、譯經的程式、參與譯場的僧職、監譯與潤文的朝臣宦者以及譯經上進的章表奏議，為研究宋代譯經制度，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的譯經制度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本文以此三部經錄為基礎，結合相關史料，從宋代譯經院的建制、譯經原本的形制與語言、譯經的程式、皇室政府對譯經人員的賞顧幾方面對宋代譯經制度進行探析，力圖將佛教目錄與譯經歷史聯繫起來，展現更為細緻的歷史圖景。文中對譯經僧職在譯場中的座次，譯經僧職的選任升遷以及賜紫衣、師號、僧官，監譯的任用等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宋代譯經 譯經程式 譯場僧職 紫衣師號

*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對於佛教譯經及其制度之考察，前賢時彥論者夥矣。梁啟超、湯用彤、賀昌群、牟潤孫諸公對此問題皆有論列。至於專論，則有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¹ 藍吉富〈貝葉傳經——佛書的翻譯〉諸文。² 而論述最為詳贍者，則推曹仕邦〈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此六萬字長文，分八個方面對中國佛教譯經進行了全面考察，論述了譯經與宣講的關係，隋前與隋唐以後譯經方式的轉變。而對譯經之職守尤為究心，分別考察了傳語、筆受、證義的歷史淵源與演變。³ 然而由於資料缺乏，前賢對宋代譯經、特別是宋代譯經制度論述甚少，五老舊侶對宋代譯經之論述，寥寥數行。而曹仕邦先生論述宋代佛教譯經制度也僅據《宋高僧傳》、《佛祖統紀》的記載，未能參稽其他資料。

北宋年間，為配合國家譯經，曾編撰三部佛教經錄：即《大中祥符法寶錄》（以下簡稱《祥符錄》）、《天聖釋教總錄》（以下簡稱《天聖錄》）、《景祐新修法寶錄》（以下簡稱《景祐錄》）。《祥符錄》二十二卷，趙安仁、楊億撰。此錄由三部分組成：卷二至卷二〇為「別明聖代翻宣錄」，收載自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重開譯場以來，迄大中祥符五年（1012）新譯之經典及東土著述；卷二一為「總排新經入藏錄」，按經、律、論分類排列新譯經典；卷二二總錄則為全書之總目錄。此錄現僅有金藏廣勝寺本，存十六卷，即卷三至卷八，卷一〇至卷一八，卷二〇，其餘六卷亡佚。《景祐錄》二十一卷，呂夷簡、宋綬等編。此錄卷一為「聖代翻譯繼聯前式錄」，收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新譯經律論之總數；卷二至卷一九為「隨譯年代區分藏乘錄」，詳細載錄大中祥符五年五月至景祐四年（1037）三月之出經情況及大事；卷二〇為「復准八例排經入藏錄」，即入藏目錄；卷二一為總目。此錄也僅有金藏廣勝寺本，存十四卷，卷三、五、七、一一、一五、一九、二〇缺，見存各卷亦有殘缺。此二錄體例基本相同，由別錄與入藏錄組成，別錄部分詳細記載宋代新譯各經之時間、譯主、證梵、筆受、綴文、證義、監譯、潤文之人，以及上進之表章，為了解宋代譯經提供了詳盡之史料。《天聖錄》，惟淨撰，為通紀各代入藏經典之目錄，卷上、卷中為《開元錄》入藏錄部分；卷下為《貞元錄》入藏錄部分及宋代新譯入藏經論。此錄也僅有金

¹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張曼濤編，《佛典翻譯史論》（收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輯，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頁171-186。

² 藍吉富，〈貝葉傳經——佛書的翻譯〉，氏著，《聽雨僧廬佛學雜集》（臺北：現代出版社，2003），頁84-106。

³ 曹仕邦，〈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張曼濤，《佛典翻譯史論》，頁186-282。

藏廣勝寺本，上卷已亡佚，現存中、下二卷。此錄卷下所載宋代新譯經，雖然僅列有經名與譯者，所收之宋代譯經多與《祥符錄》及《景祐錄》相同，然後二錄現皆有闕卷，可據此錄略作補充，故仍有參考價值。此三部經錄與《宋會要輯稿》、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對宋代譯經多有涉及，為吾人研究宋代譯經及其制度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一九六六年，冉雲華 (Yün-hua Jan) 首先利用《祥符錄》、《景祐錄》以及《宋會要輯稿》等材料研究宋代譯經，側重於譯主天息災、施護等人生平的考察。⁴ 黃啟江〈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考察了宋代譯經院的設立與職掌，重點論述了譯經潤文官與佛教之關係。⁵ 此後，沈丹森 (Tansen Sen) 在冉、黃二氏研究的基礎上，對宋代的譯經進行了研究，旨在分析宋代新譯經未能對中國佛教產生影響的原因。⁶

對宋代譯經及其制度進行深入研究者，首推香港學者梁天錫。其〈北宋漢譯佛經之類別、部卷、譯者及譯成時間考——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一〉分三期對宋代七朝（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的譯經情況進行了詳明的考察與統計。⁷《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二》一書則更側重從制度層面討論宋代譯經：分別從北宋譯經制度的產生與發展，傳法院之建築物、相關機構與公程式，譯院編制，譯席、譯材的來源，譯經暨其前後程序，譯席俸賜，傳法院人員之兼差與院藏官修宋人佛學文字八個方面，對北宋譯經制度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察，的為研究宋代譯經的宏論巨篇。⁸ 雖然如此，宋代譯經制度尚有諸多問題未能解決，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澄清。故不揣譾陋，以宋代三部經錄為中心，結合其他史料，稍做補苴，以見宋代譯經之盛。

⁴ Yün-hua Jan, "Buddhis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Sung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s* 6.1 (1966): 24-42.

⁵ 黃啟江，〈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氏著，《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68-92。

⁶ Tansen Sen, "The Revival and Failure of Buddhist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ung Pao* 88.2 (2002): 27-80.

⁷ 梁天錫，〈北宋漢譯佛經之類別、部卷、譯者及譯成時間考——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一〉，張其凡主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10 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53-105。

⁸ 梁天錫，《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二》（香港：志蓮淨苑，2003）。

一・譯經院之建制

歷代國家譯經多有專門之場所，姚秦之逍遙園，李唐之大慈恩寺、翠微宮是其著者。宋代譯經則有譯經院之建設，《宋會要》記太平興國五年，天息災、施護至京師，通曉華、梵文字，宋太宗有意於譯經，即有譯經院之興建：

是年，詔中使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譯經僧以次分設堂室。至七年六月院成，召天息災等三人入院。⁹

由《宋會要》所載，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宋代譯經院之建設可得而言之者，有如下數端：

第一、譯經院位於太平興國寺大殿之西。¹⁰ 太平興國寺，初名龍興寺。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以新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¹¹ 可知，太平興國寺原名「新龍興寺」，太平興國二年始改「太平興國」寺額。而龍興寺於周世宗時廢，宋代重興。志磐《佛祖統紀》載：「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為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劍詰之曰：『前朝為倉日久，何為煩瀆天廷？』且密戒：懼即斬之。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勅復以為寺。」¹² 新龍興寺之復建，或在開寶八年左右。據《宋史》記載，宋太祖於開寶八年（975）十一、十二月，開寶九年八月三次臨幸「新龍興寺」。¹³

《東京夢華錄》載，太平興國寺在右掖門西，背對西角樓大街，南臨汴河，河上有興國寺橋。¹⁴《汴京遺蹟志》載：「興國寺有二，一在馬軍橋東，北宋太平

⁹ 徐松輯，郭聲波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658。

¹⁰ 贊寧《宋高僧傳》亦言：「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五載……因勅造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之西偏。續勅搜購天下梵夾，有梵僧法護、施護，同參其務。」由此可證，譯經院確在太平興國寺之西。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57-58。

¹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八，頁396。

¹²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四四，頁1027。

¹³ 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三，頁45, 48。

¹⁴ 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二「河道」、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頁25, 274。

興國間創建，金季兵燬。」¹⁵ 由此可知，金代末年，太平興國寺毀於戰火。太平興國寺（龍興寺）為東京重要之佛教寺院，太祖、太宗多次臨幸。

除譯經院外，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又於太平興國寺譯經院西建印經院，印製《開寶藏》及新譯之經典。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又於太平興國寺設立戒壇。《佛祖統紀》載：「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¹⁶ 仁宗天聖年間，又於太平興國寺建開先殿，以安太祖御容。王應麟《玉海》載：「開先殿，天聖八年三月建太祖神御殿於太平興國寺之後。十月成，壬辰奉安。」¹⁷ 宋代譯經院除翻譯佛經之外，還是接待安置外來僧侶之場所。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來朝，「太宗召見裔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¹⁸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沙門覺稱、法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真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於譯經院」。¹⁹ 而日僧成尋於神宗熙寧五年兩人東京，皆駐錫於太平興國寺傳法院。

第二、譯經院由三堂構成。如《宋會要》所言：譯經院由三堂構成，即譯經堂、潤文堂與正義（證義）堂。譯經堂在正中，東為潤文堂，西為證義堂。志磐《佛祖統紀》亦言：太平興國五年，「二月，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曩國三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²⁰ 由此可證：當時譯經院包括三堂，即中間為譯經堂，為譯主、證梵等人所居；東邊為潤文堂，為譯經潤文官所居；西邊為證義堂，為譯經證義僧侶所居。

此外，譯經院中尚有太宗、真宗御製〈聖教序〉、〈繼作聖教序〉巨碑刻石。太宗〈聖教序〉立於雍熙三年（986），據《玉海》記載：「三年十月戊午，御製〈新譯三藏聖教序〉以冠經首，令刊石御書院。」²¹ 真宗〈繼作聖教序〉作於咸平二年，當時僅冠於新譯經之首。大中祥符二年，施護等請求將〈繼作聖教序〉刊石

¹⁵ 李濂，《汴京遺蹟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卷一〇，頁619。

¹⁶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五，頁1054。

¹⁷ 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一六〇，頁2950。

¹⁸ 脫脫等，《宋史》卷四九一，頁14134。

¹⁹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五，頁1054。

²⁰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頁1029。

²¹ 王應麟，《玉海》卷一六八，頁3080-3081。

馮國棟

於譯經院，得真宗許可。其年九月，立石於譯經堂上，與太宗所製序西面對安。置。²² 成尋熙寧五年入京，十月十四於傳法院親見此二碑，其文云：「未時，見太宗皇帝御筆碑石，高二丈，立三階大閣內，無他佛等。次見真宗皇帝御筆碑文，立三間大殿之內，額名乾明之殿，無他佛。」²³ 太宗、真宗御製碑高二丈，立於三間大殿之中，氣勢之宏偉可見。

二・譯經原本之語言與形制²⁴

宋代譯經之展開，肇啟於梵夾之搜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對西行、東歸之僧侶，多有獎顧。據《宋會要》載，自雍熙三年，「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束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除優禮西行東歸之僧侶外，太宗又兩次下詔，搜訪梵經。雍熙三年，接受天息災建議，下詔購求搜訪散落於民間之梵夾。淳化四年（993）復下詔：「西面緣邊及黎、階、秦、廣州，應梵僧自天竺來及中國僧遊天竺還者，所齎梵經並先具奏聞，仍封題進上。」²⁵ 梵夾葉書的搜求，為譯經事業奠下基礎。

宋代譯經原本梵夾之形制，日僧成尋熙寧年間寄居太平興國寺譯經院，頗有親睹，且有所記錄，據其所見，可略知一二。熙寧五年十二月廿八日，成尋見《月燈三昧經》《無量壽經》及《彌勒授化經》梵夾，其文曰：

齋了，天吉祥三藏召請予與新來中天二人、通事，共喫茶。次見《月燈三昧經》梵夾、《無量壽經》梵夾、《彌勒授化經》梵夾，字甚妙也。貝葉長一尺六寸，廣三寸，各入金莖，兩重裏錦綾。²⁶

熙寧六年正月廿六日，又見中天竺貝葉梵本數種：

²² 楊億等編，《大中祥符法寶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7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一五，頁493-497。

²³ 成尋著，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四，頁282-283。

²⁴ 梁天錫《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中第五章專論「釋材來源」，然其所論為獻梵夾之人，如「宋僧遊天竺取經還」、「番僧及南海使貢經」等，未涉及梵夾語言的問題。

²⁵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662

²⁶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五，頁450。

次參三藏房，點茶，令出見《父子合集經》梵本。且出來廿五卷，未徹。《祕密名字三摩地分》梵本、《青焰明王儀軌》梵本、《房莊嚴寶王經》梵本，皆中天竺貝葉，最優美也。²⁷

二月廿七日，又見《父子合集經》及《法花經》貝葉梵夾：

拜見《父子合集》二卷了……雖廿五卷譯出，第三以下未清書進覽，因之不能拜見。廿五以下，貝葉向有其殘，未譯。進覽經以錦為標紙，以金為軸，莊嚴甚妙也。見丈夫國梵本《法花經》，八寸，廣二寸五分。貝葉，第一卷四枚，第二卷五枚半，第三卷四枚，文字頗小字也。《父子合集經》貝葉長一尺五寸，廣三寸，四十枚，譯出廿五卷。雖多羅葉文少，漢字譯出，枚數多也。²⁸

其中《月燈三昧經》、《無量壽經》、《彌勒授化經》、《父子合集經》皆為寬三寸、長一尺五、六寸的貝葉。而丈夫國梵本《法花經》甚小，寬二寸五分，長僅八寸。唐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言：「北天竺境富婁沙富羅，此云丈夫國。」²⁹可知，成尋所見小字本《法花》乃北天竺梵本。

熙寧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又見東天竺梵本，與中天竺梵本頗為不同：

丈夫國三藏來座，以照大師取紙梵經兩卷來，令見予。東印度梵字全不似中天，不知何經。³⁰

正如成尋所見，宋代譯經之原本既有中天竺梵本，復有東天竺、北天竺丈夫國等地方書體書寫之梵本，而宋代經錄也記載有不同地方書體書寫的梵經。

據《祥符錄》與《景祐錄》記載，宋代譯經確知其原本者共 189 種，³¹ 其中譯自中天竺梵本者 164 種，佔了 86.8%。譯自西天竺梵本者共 9 種，譯自北天竺梵本者 1 種，譯自中天竺語師子國書者 2 種，譯自中天竺語龜茲國書者 13 種（統計見表一、二、三）。

²⁷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頁 524。

²⁸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頁 566-567。

²⁹ 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收入《大正藏》第 4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卷一，頁 659。

³⁰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五，頁 452。「令見予」，原作「令見印」，據《大藏經補編》本改。

³¹ 由於《祥符錄》、《景祐錄》皆屬殘本，故所列非宋代全部譯經。

表一：北宋譯經原本比例表

原本語言	中天竺 梵本	西天竺 梵本	北天竺 梵本	中天竺語 龜茲國書	中天竺語 師子國書	總計
數量	164	9	1	13	2	189
百分比	86.8%	4.8%	0.5%	6.9%	1.0%	

表二：北宋譯經中天竺梵本類別表

部類	數量	百分比
大乘經藏秘密部	72	43.9%
大乘經	30	18.3%
大乘律	2	1.2%
大乘論	11	6.7%
小乘經	25	15.2%
小乘律	2	1.2%
小乘論	0	0.0%
西方聖賢集	22	13.4%
合計	164	

表三：北宋譯經非中天竺梵本表

原本語言	譯經時間	經典名稱	卷數	所屬類別	資料出處
西天竺梵本	淳化元年十月	七佛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7
		毗婆尸佛經	2	小乘經	
		大三摩惹經	1	小乘經	
		長者施報經	1	小乘經	
	淳化五年四月	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3	大乘經秘密部	《祥符錄》卷 8
	至道三年十一月	大正句王經	2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0
	咸平四年四月	大生義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1
	咸平五年五月	輪王七寶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2
北天竺梵本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	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	3	小乘經	《景祐錄》卷 2
中天竺語龜茲國書	淳化五年正月	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大教王經	3	大乘經秘密部	《祥符錄》卷 8
		頻婆娑羅王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0
		舊城喻經	1	小乘經	
		人仙經	1	小乘經	
		信佛功德經	1	小乘經	
		信解智力經	1	小乘經	
		善樂長者經	1	大乘經秘密部	
	咸平元年十一月	四品法門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0
		解夏經	1	小乘律	
	咸平三年十一月	分別緣生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1
	咸平四年四月	園生樹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1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	月喻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4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原本殘，推測)	蟻喻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4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灌頂王喻經	1	小乘經	《祥符錄》卷 16
中天竺語師子國書	雍熙四年	(妙臂菩薩所問經)	4	大乘經秘密部	《祥符錄》卷 6
	咸平三年十一月	未曾有正法經	6	大乘經	《祥符錄》卷 11

由以上三表可知如下數事：

第一、宋代譯經原本多為中天竺梵本，共有 164 部。在中天竺梵本中，大乘經藏秘密部共 72 部，佔 43.9%；大乘經 30 部，佔 18.3%。兩者合計佔 62.2%。大乘律 2 部，佔 1.2%；大乘論 11 部，佔 6.7%。小乘經 25 部，佔 15.2%；小乘律也為 2 部，佔 1.2%。西方聖賢集 22 部，佔 13.4%。中天竺梵本中，沒有小乘論。

第二、除中天竺梵本外，中天竺語龜茲國書、西天竺梵本數量不少，而北天竺梵本和中天竺語師子國書的原本則較少。

第三、據 Richard Salomon 的研究，從四世紀至六世紀，梵語的各種地方性字體興起，至六世紀，梵語的不同書寫形式有多種，比如北印度的悉曇體、南印度的帕拉瓦體等。³² 宋代經錄中記載的非中天竺梵本可能主要指這些地方性字體書寫的梵文。比如中天竺語師子國書可能就是用僧伽羅文書寫的梵文文本。翻譯這些非標準梵本，其程序是：先將地方性字體轉寫為中天竺標準字體，然後再譯為華文，而不是將這些非中天竺梵本直接譯為華文。《祥符錄》卷六載譯自中天竺語師子國書的經典，下注云：「上一部，本中天竺語師子國書，今先翻為天竺字，然後譯之，下皆同此。」³³「下皆同此」說明《祥符錄》中所載地方性字體書寫的梵本皆要先轉寫為中天竺字。再如《景祐錄》所載《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下記曰：「上一部，本西天竺書，今先翻為中天竺字，然後譯從華文。」³⁴ 同樣說明，《景祐錄》所載非中天竺梵本也要先經轉寫，再譯為華文。

第四、從這些非中天竺梵本經典的性質來看，小乘經律所佔的比例極高。其中「西天竺梵本」9 種，除《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屬於「大乘經秘密部」外，其餘 8 種皆為小乘經。「中天竺語龜茲國書」13 種，除《善樂長者經》屬「大乘經秘密部」外，其餘 12 種皆為小乘經律。這與中天竺梵本大乘經、論佔多數，形成對比。另外，與整個宋代譯經相比，這些非中天竺梵本中小乘經律所佔比例也是極高的。《天聖錄》記載宋代譯經 232 部 569 卷，其中，大乘經 140 部 286 卷；大乘律 1 部 1 卷；大乘論 11 部 19 卷；小乘經 44 部 69 卷；小乘律 5 部 5 卷；聖賢撰述 21 部 29 卷。小乘經佔總數的比例，依部數為 18.96%，依卷數則為 12.12%。而這些非中天竺梵本共 25 部 41 卷，小乘經則有 19 部 23 卷，小乘經所佔比例，依部數為 76%，依卷數 56.10%。由此可見，在這些非中天竺梵本中，小

³² Richard Salomon, *Indian Epi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8-42.

³³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六，頁 432。

³⁴ 呂夷簡等編，《景祐新修法寶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73 冊），卷二，頁 530。

乘經所佔比例遠遠超過宋代全部譯經中小乘經所佔比例。

而在這些經典中，小乘經所佔比例尤以中天竺語龜茲國書和西天竺梵本為高。何以如此？眾所周知，龜茲自鳩摩羅什時代之後，小乘逐漸流行，「玄奘時代，龜茲已全為小乘教所佔有」。³⁵ 據唐惠英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載：聖曆年中，于闐三藏實叉難陀云：「龜茲國中，唯習小乘。」³⁶ 可知在唐代，龜茲也為小乘教之化區。而西、北天竺向為小乘說一切有部和正量部的化區，玄奘時代，正量部由中印度向西印度發展，而說一切有部則盛行於西北印度與西域。在義淨時代，西天竺正量部最具優勢，而西北印度則以說一切有部最盛。³⁷ 由此可見，大約四至九世紀，龜茲國、西印度、北印度小乘佛教一直非常興盛，那麼宋代所譯的以這些地方性字體書寫的梵本多為小乘經典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譯經程序與人員

宋代譯經持續了一百三十一年，譯出經典二百六十三部，七百四十卷，³⁸ 涉及的人員甚夥。夏竦〈傳法院碑銘〉言及宋代譯場設立至景祐二年的譯經人員：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護；東土一人：惟淨），筆受、綴文、證義等義學僧七十九人，監譯十七人，貢獻梵經者一百三十八人。³⁹ 足見宋代譯經人員之眾。

（一）各書所載譯經人員之職守

佛經譯傳，自南北朝以來，形成了譯場共譯的制度。譯場中譯經人員各有所司，共同翻譯經典。對宋代及以前譯場中人員職守的記載，共有以下數種文獻，即《宋高僧傳》卷三〈譯經篇總論〉、《佛祖統紀》卷四四、《宋會要輯稿》「道釋二・傳法院」以及《祥符錄》、《景祐錄》。《宋高僧傳》所載雖反映了宋代

³⁵ 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197。

³⁶ 惠英，《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收入《大正藏》第51冊），卷一，頁176。

³⁷ 水野弘元、中村元等著，許洋主譯，《印度的佛教》（臺北：法爾出版社，1988），頁101-110。

³⁸ 梁天錫，《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頁158-159。

³⁹ 夏竦，《文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7冊），卷二六，〈傳法院碑銘〉，頁263-264。

的狀況，但所舉各例多為前朝人物，與其他三種資料性質略有不同。茲列表對比如次：

表四：譯場職守異同表

祥符錄、景祐錄	宋會要輯稿	佛祖統紀	宋高僧傳
1. 譯主	1. 譯主	1. 譯主	1. 譯主
2. 證梵義	2. 證梵義	2. 證梵義	5. 證梵義
3. 證梵文	3. 證梵文	3. 證梵文	4. 證梵本
4. 筆受	5. 筆受	5. 筆受	2. 筆受（綴文）
5. 綴文	6. 綴文	6. 綴文	
6. 證義	7. 證義	7. 參譯	6. 證禪義
7. 潤文	9. 潤文	9. 潤文	7. 潤文
8. 監譯			10. 監護（監譯）
	4. 書梵	4. 書梵	3. 度語
	8. 刊定	8. 刊定	8. 梵唄
			9. 校勘
			11. 正字（字學）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書所載皆有譯主（主持譯經之人）、證梵義（與譯主商討梵文文義之人）、證梵文（《宋高僧傳》稱「證梵本」，與譯主商討梵文文字、語言之人）。可以說，此三人為一組，皆需梵、漢兩通的譯才擔當。筆受（記錄漢語譯文之人），《宋高僧傳》將筆受、綴文合為一職，反映出唐代以前筆受與綴文相兼的情況。⁴⁰ 證義（與譯主商討漢文文義之人）一職，《佛祖統紀》稱為「參譯」，或即《宋高僧傳》中所稱「證禪義」。《宋會要》與《佛祖統紀》皆載有「書梵」（將梵文語音用漢字書寫下來，即用漢字標梵音）與「刊定」（校定經典文字），而《宋高僧傳》尚載有「度語」（幫助譯主將梵文釋為漢文，主要用於譯主不熟悉漢文的譯場）、梵唄（在譯場中讀誦經典之人）、正字（或稱「字學」，譯經場中熟悉漢文語言、文字之人，或可與《宋會要》、《佛祖統紀》中的刊定相兼）。《祥符錄》與《景祐錄》詳細記載每部經典的翻傳時間、經典的

⁴⁰ 曹仕邦〈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認為綴文一職本由筆受分化而出，初期筆受、綴文多相兼。頁 224-234。

內容性質及翻譯、進呈之過程，是宋代譯經的忠實記錄。書中詳載每部經典的翻譯人員，有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證義、潤文、監譯，應當說，兩部經錄所載譯經僧職是對北宋譯場僧職最真實的記錄。⁴¹

如將宋代經錄所載譯場職位與隋唐譯經進行比較，梵唄、度語、正字、讀梵本似不見於宋代譯經。梵唄是指譯經前進行的儀式活動，如下所述，宋代譯場譯經前做「法曼荼羅」道場，當也有梵唄之事，然不見於經錄的記載。度語主要用於譯主不通華文情況，實為譯主之私人翻譯。宋代天息災、施護、法護，皆華梵兼通，而惟淨本為華人，兼習梵語，故宋代前期並無度語之設。後期主持譯經之金總持，似華語不嫻，設有度語。正字，在唐代譯場多設，宋代譯場未見設置。讀梵本一職，數種文獻皆不載，然唐代義淨翻經，多置此職。如景龍四年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及《成唯識寶生論》，由西涼州白塔寺慧積、右驍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宿衛李釋迦、東天竺國左領軍右執戟直中書省頗具三人讀梵本。宋代譯經，據成尋之記載，熙寧六年譯經「先大卿取梵文一紙談了，次筆受智寶取梵文一句讀之」，⁴² 則由筆受讀梵文，此時或已由筆受兼讀梵文之職也未可知。

（二）譯經壇場之佈置與譯經之程序

據《祥符錄》記載，真宗景德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幸譯筵，命施護等坐，賜茶慰勞。詢問譯經儀範，仍頒束帛。翌日，施護等詣便殿稱謝，遂以譯經儀式備錄上進」。⁴³ 由此可知，施護等人曾進「譯經儀式」於真宗，惜今無傳，內容不可詳知。然《宋會要》、《佛祖統紀》曾記天息災所述「譯經儀式」，夏竦曾擔任譯經潤文官，撰有〈傳法院碑銘〉，對宋代譯場之儀式也有記載，由此可略知宋代譯經壇場之佈置與譯經之程序：

⁴¹ 曹仕邦先生未見宋代三部經錄，認為《宋高僧傳》上進於端拱元年，而《佛祖統紀》則成於宋度宗咸淳七年（1269），「二書相去二百八十四載。且贊寧身居汴京，親覩盛事，故所記之價值，實遠在《統紀》之上」，實不足為憑。（曹仕邦，〈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頁259）

⁴²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七，頁647。

⁴³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三，頁482。另《法苑珠林》卷一〇〇載隋代翻經沙門明則曾撰《翻經法式論十卷》，當為隋代譯經儀軌之記錄。

表五：《佛祖統紀》與《宋會要》所記譯經程式

佛祖統紀	宋會要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作壇以粉飾之，事在藏經）。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環遶其上，如車輪之狀），目曰「大法曼拏羅」（此云大會）。請聖賢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設香華、燈水、穀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	天息災等所述自古譯經儀式：將欲翻經，於本院建立道場。施護請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晝夜。又設木壇，作聖賢位，布聖賢字輪，目曰「大法曼拏」。眾迎請聖賢闍伽沐浴，香花燈塗。菓實飲食，二時供養，禮拜旋繞，請祈民祐，以殄魔障，僧羅日二時虔禱。
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 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 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 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𑖀(kṛ) 𑖄(da) 𑖥(ya)，初翻為「訖哩第野」；𑖦(su) 𑖧(tram)，為「素怛覽」）。 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訖哩那野」，再翻為「心」；「素怛覽」，翻為「經」）。 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為「佛念」，「打鐘」為「鐘打」。故須回綴字句，以順此土之文）。 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 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如「無無明無明」，剩兩字。如「上正遍知」，上闕一「無」字）。 第九潤文官，於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如《心經》「度一切苦厄」一句，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兩字，元無梵本）。	譯日，第一譯主當面正坐，前梵學。 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與譯主評量梵義。 第三證梵文梵僧，聽譯主高讀梵本，以驗差誤。 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當聽譯主宣讀讀書，為隸字。 第五梵學僧筆受， 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 第七證義僧，參詳向義， ⁴⁴ 第八字梵學僧，刊定字， 第九潤文官，於僧眾南別設位，參詳潤色。
僧眾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 ⁴⁵	譯僧每日沐浴，嚴潔三衣、坐具，威儀整肅。凡入法筵，依位而坐，不得紊亂。翻譯應須受用，悉從官給。譯之日，別設齋席。 ⁴⁶

⁴⁴ 「向義」，疑當作「句義」。⁴⁵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頁1031。⁴⁶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658-659。

《宋會要》與《佛祖統紀》所載天息災之譯經儀式略可分為三節：第一節記譯經聖壇之佈置，第二節記譯經僧職之座次與職守，第三節記譯經僧之威儀。其中第三節僧眾之威儀問題不多，現詳考前二節如次：

1. 聖壇佈置

譯經之前，先於東堂（當為潤文堂）向西佈置聖壇，聖壇四角設立四門，每門一梵僧主之，念咒語七晝夜。又立木壇，設立聖賢名字輪，輪之形制，志磐言「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環遶其上，如車輪之狀」，也即於圓形壇上，書寫佛、菩薩和天神之「名位」。聖壇佈置完畢之後，有迎請佛、菩薩及天神之儀式，並用香花、水燈供養。

關於聖壇佈置，夏竦〈傳法院碑銘〉言：「由是憲前軌，稽秘藏，依金剛界挖種子壇，書字源，布聖位，三成藻飾，四事莊嚴。」⁴⁷ 此處之「挖」為「揩擦」義，如《漢書·禮樂志》：「挖嘉壇，椒蘭芳。」「挖嘉壇」就是畫出美好的壇場。文中「依金剛界挖種子壇」，即依據金剛界粉畫「種子壇」。所謂「種子壇」，又稱「種子曼荼羅」、「法曼荼羅」，為四種曼荼羅之一，⁴⁸ 係用梵文字母表示諸尊而形成的曼荼羅，文中所言「書字源，布聖位」正是指佈置種子壇。《佛祖統紀》所言「大法曼拏羅」，「宋會要」所謂「大法曼拏」，即是夏竦所說「種子壇（種子曼荼羅）」。

2. 譯經僧職之座次

譯經之日，譯經僧侶入座譯經，各有其位，「依位而坐，不得紊亂」。譯主「當面正坐」「正坐面外」，皆指譯主坐北向南，居於譯場正中。夏竦〈傳法院碑銘〉亦言：「三藏主譯於壇北。」譯經潤文官則與譯主對面向內而坐，也就是「於僧眾南向設位」「於僧眾南別設位」。而監譯的位置，則在西南，〈傳法院碑銘〉「潤文東南以資筆削，監譯西南以肅儀律」。⁴⁹

除譯主、潤文、監譯外，其他僧職之位次，《宋會要》與《佛祖統紀》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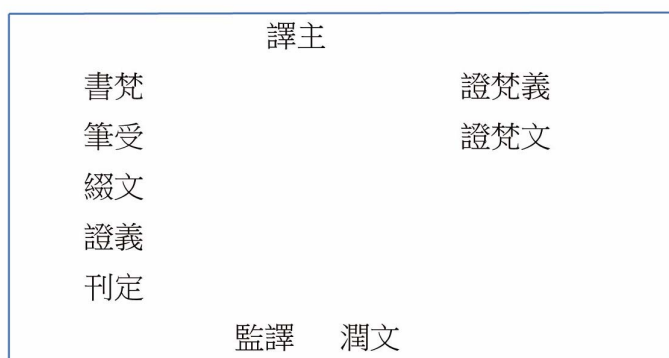
⁴⁷ 夏竦，《文莊集》卷二六，頁262。

⁴⁸ 除種子曼荼羅外，其餘三種：1. 大曼荼羅，用諸尊具足相好容貌的圖畫來表示；2. 三昧耶曼荼羅，將象徵本尊的法器、持物，以圖繪表示；3. 羯磨曼荼羅，將諸尊的威儀事業鑄造成像，形成立體、行為的三度乃至四度空間的行動性曼荼羅。

⁴⁹ 夏竦，《文莊集》卷二六，頁262-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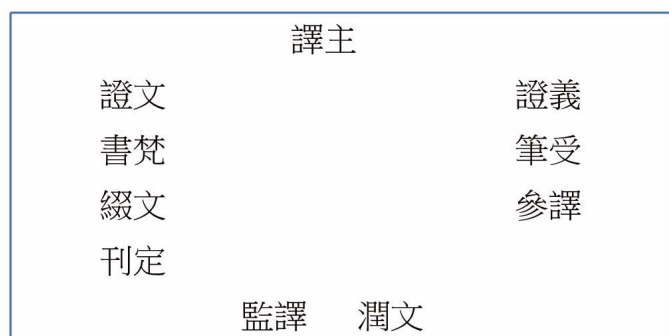
馮國棟

載頗為不同，《宋會要》言：「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第三證梵文梵僧；其右，第四梵學僧……第五梵學僧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參詳向義，第八字梵學僧，刊定字。」亦即是說：以譯主為中心，分為左、右二班，左邊有證梵義、證梵文；右邊則有書梵、筆受、綴文、證義、刊定。位次如下圖（圖一）：



圖一：《宋會要》所載譯場位次

而《佛祖統紀》則言：「第二證義坐其左……第三證文坐其右……第四書字梵學僧……第五筆受……第六綴文……第七參譯……第八刊定。」除前二員外，其餘皆未注明位次。然依其證義在左，證文在右之例，似乎下面諸員應分列左右，亦即如下圖所示（圖二）：



圖二：《佛祖統紀》所載譯場位次

然則，二者以何為是，以何為非？筆者認為，《宋會要》之文，當有所據，何以言之？

第一、從史料的來源與時間來看，《宋會要》之文或直接來自於天息災、施護所上之譯經儀式，或來源於大中祥符元年所編《譯經院實錄》。⁵⁰ 時間上早於《佛祖統紀》。而《佛祖統紀》之文，即來自於宋代會要。《佛祖統紀》書前所列參稽書籍「儒宗諸書」中有「國朝會要」。而上引記載宋代譯經僧職之文，出自其書「法運通塞志」，此志「乾德三年」條後注曰：「此後不注出處者，大約多國朝會要。」⁵¹ 也即是說此卷中不出注者，皆引自「國朝會要」。而記載譯經僧職這一條正好無注，說明志磐《佛祖統紀》對譯場僧職位次之記載，來源於宋代的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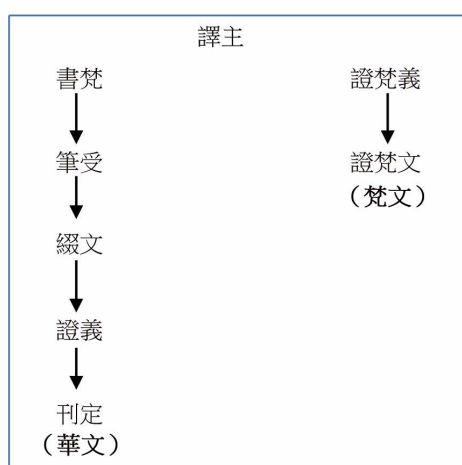
既然志磐之文來源於宋代會要，何以與現《宋會要》之記載不同？筆者認為，可能是志磐誤讀了《會要》之文，因為據《會要》的記載，譯主之右有書梵、筆受、綴文、證義、刊定五員，而其左僅有證梵義、證梵文兩員，左右甚不均衡。而《會要》言：「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第三證梵文梵僧；其右，第四梵學僧……」志磐將本屬領起下文的「其右」上屬，於是就成了《佛祖統紀》中「第二證義坐其左……第三證文坐其右」的樣子。將本屬統領下文的「其右」，安在了第三證梵文之上。而第四員以下，可能志磐也覺得並無絕對之信心，故不書其餘僧職之位次。

第二、就譯經工作的程序而言，《宋會要》所記較《佛祖統紀》更為合理。因為據《宋會要》所記，證梵文、證梵義在左，因為他們所處理的都是梵本的問題，梵本傳閱比較方便。而書梵、筆受、綴文、證義、刊定所處理的都是「華言」，依次傳閱，甚為方便。也即是說，按《宋會要》所載，梵本、漢本，僅需依位置相次傳遞，即可完成譯經的工作。而如依《佛祖統紀》之記載，證梵義在左，證梵文在右，則證梵義閱完的梵文文本，必須傳給坐於對面的證梵文，頗費周章。而漢本華文的傳遞就更為複雜，先由在右的書梵傳給在左的筆受，再由在左的筆受傳給在右的綴文，然後由在右的綴文傳給在左的參譯，再由參譯傳給在右的刊定，一個本子經過四次左右轉遞，才能最終完成，何其費時費力？以下是《宋會要》與《佛祖統紀》梵漢文本傳遞的路線圖（圖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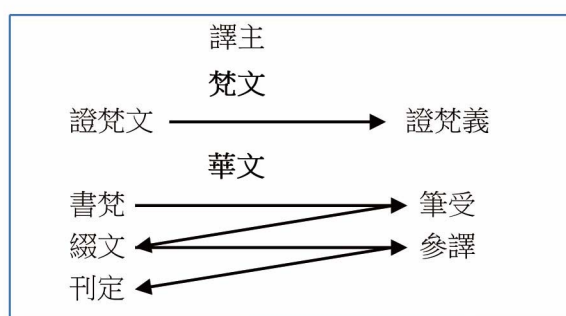
⁵⁰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四：「（景德四年）詔曰：修史院奏：竺乾之教，列聖攸崇，大慈均守位之仁，善救協好生之德。闢金田而構宇，翻貝葉以騰文，用攝民心，有資邦治。伏觀太宗興置譯經院因依，及後來翻譯經文等事，乞下譯經院實錄供報。明年七月，編成一十卷，送上修史院。」頁488。

⁵¹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頁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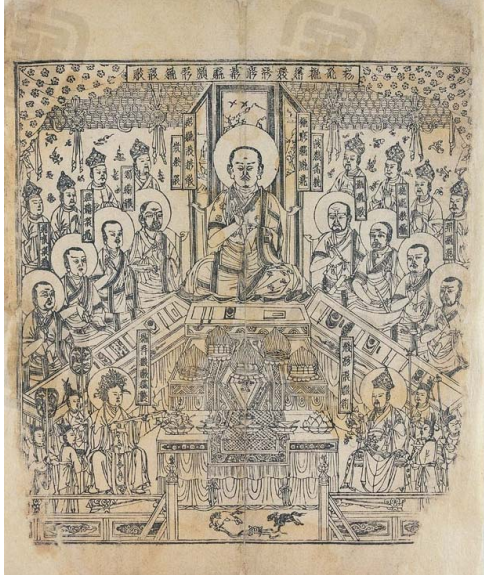
第三、據夏竦〈傳法院碑銘〉的記載，「三藏主譯於壇北，梵僧證梵義、證梵文，義學僧證義、刊定華字于左右」，也將梵僧與義學僧分開，說他們分列左右。由此可知，譯經僧職位次之排列並非出於均衡考慮，而是出於僧人的身分及譯經工作的方便。今所存《西夏譯經圖》（圖五）及元代普寧藏前扉畫《萬壽殿譯經圖》（圖六）譯位皆採用了左右對稱的結構，實際都是出於構圖的需要，而非對譯場位次的忠實記錄。



圖三：《宋會要》位次圖文本傳遞示意



圖四：《佛祖統紀》位次圖文本傳遞示意



圖五：西夏譯經圖⁵²



圖六：萬壽殿譯經圖（擬）⁵³

綜上所考，筆者認為志磐《佛祖統紀》中關於譯場僧職位次的記載，來源於宋代的會要，志磐所記之所以與現存《宋會要》不同，或即是志磐出於位次排列均衡的考慮而誤讀了宋代會要之文，將本該總領下文的「其右」二字安在了「第三證梵文僧」之上，出現了僧職依次左右排列的情況。然而，處之於譯經情景之中，志磐所記於譯經之程序頗顯不便，需要多次越過譯經堂，左右傳遞文本。而《宋會要》所記，則僅需按位置依次傳遞文本即可完成譯經。職是之故，筆者認為《宋會要》所記譯經僧職的位次更為合理有據。

對於譯經之具體情狀，文獻記載不多。成尋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居譯經院，親見其時之譯經，為了解當時譯經具體情狀提供了寶貴史料：

廿八日（辛未），天晴，卯二點，御藥來。今日新譯《父子合集經》三、四卷，潤文右諫議參知政事馮京來，有僧俗齋。……御藥云：「列譯經證義座，看譯經，并可喫食由者。」隨使來出譯庭。先大卿取梵文一紙談了，次筆受智寶取梵文一句讀之，梵才三藏唱漢語，筆受書了。次讀梵文一句如前。如

⁵² 《西夏譯經圖》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參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1：215-229。

⁵³ 《萬壽殿譯經圖》（擬）係普寧藏《法句經》前扉畫，雲南民間藏家陳璞先生所藏，參陳璞、尹恆編，《昆明元寧齋藏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13）。此經，上海師範大學侯沖先生見告，當為元代所印磧砂藏，待考。

此一紙譯了，詔同譯少卿讀漢語了。前後燒香、薰香，有手水散。下座，證義一人發願迴向，唱寶號，奉祈皇帝。⁵⁴

文中「大卿」即試鴻臚卿日稱，「少卿」即試鴻臚少卿惠賢。「梵才三藏」即惠詢，為證義僧。智寶為慈教寺僧人，譯經筆受。⁵⁵ 由此可知，當日譯經，先由譯主日稱翻譯講解一紙大義。接下來再做分句翻譯，先由筆受智寶讀梵文一句，由證義僧惠詢讀漢語，然後筆受書寫。一紙譯完，再由惠賢通讀漢語。可見，首先，譯經程序並非嚴格按照九位僧職依次作業，而採用比較隨意的形式。第二，譯經前後，皆有燒香儀式，譯經完畢，還要由證義僧發願回向，念佛，並為皇帝祈福。

（三）譯經僧的選任與變動

宋代譯經人員按其職守可分為四類：一類主要處理梵文，包括譯主、證梵義、證梵文，也即夏竦在〈傳法院碑銘〉中稱為「梵學僧」者；另一類主要處理華文，包括綴文、證義，也即夏竦所謂「義學僧」者；第三類華梵皆要處理，如書梵、筆受；第四類則是由朝臣、宦者兼任的潤文官與監譯。綜觀《祥符錄》與《景祐錄》的記載，譯經僧職選任主要有以下特點：

1. 除譯主等重要人物外，進入譯場之僧侶多要經過考察程序。最初進入譯場，率由推薦。如太平興國七年，譯場初設，「又詔鳳翔梵學沙門建盛充筆受，京師義學沙門慧達、可瓌、善祐、法雲、智遜、惠溫、守巒、道真、實顯、慧超等十人充證義」。⁵⁶ 天禧四年之後，採用法護、惟淨之建議，實行舉薦加考試之形式，「三藏法護、惟淨上言：譯席有關員，臣等於京城寺院訪求名德舉奏，深慮品藻未精，自今望令開封府遣官，集兩街僧職及見講經律論僧三十人僉定，試本學十道，如對答得通，即奏名差補。詔從之」。⁵⁷ 所謂「兩街僧職」，在宋代主要有僧錄、僧正、副僧錄、首座和鑒義，左右各五，合為十員。由此可知，當時譯場僧職選任之程序為：先由譯主、名德推薦，後由兩街僧職及講經律論僧面試，各試本業十道，通過方能奏補。而至仁宗天聖六年，「是時譯席有關，本院請依試僧職例選試，遂令兩街保舉深達經論，素有名行，眾所推服者凡五人。詔翰林學士章得象，精加考試，乃得潛政等」。⁵⁸ 此時之差補先由兩街保舉，再加

⁵⁴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七，頁646-647。

⁵⁵ 成尋記錄了當時譯經僧人之姓名與職守，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頁283-284。

⁵⁶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頁416。

⁵⁷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六，頁575。

⁵⁸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七，頁582。

考試。由此可見，進入譯場之程序先由舉薦，後期制度加密，採用薦舉加考試的形式。

2. 梵學僧必須有梵、漢雙語的修養，義學僧如果沒有梵語學習的經歷，幾乎不可能升為譯主、證梵義與證梵文。從宋代的情況來看，譯主、證梵義、證梵文三職可以互相兼任、輪任。如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譯《大乘莊嚴王經》，譯主為天息災，證梵義為法天，證梵文為施護；同年七月譯《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時，法天為譯主，天息災為證梵義，施護仍為證梵文；同年十月，譯《守護大千國土經》等經時，施護為譯主，天息災為證梵義，法天為證梵文。⁵⁹ 再如，咸平三年，法賢（天息災）入滅，其年十一月譯《未曾有正法經》等經時，法天為譯主，施護兼證梵文、證梵義兩職。四年四月，譯《分別佈施經》等時，施護為譯主，法天兼證梵文、證梵義。⁶⁰ 由此可見，梵學僧之間的職守可以互相兼任，而義學僧由於沒有梵學基礎，不可能升為譯主、證梵文、證梵義。咸平四年十一月，法天入滅，由傳法院培養的梵學僧惟淨證梵文。

3. 義學僧職雖不能與梵學僧職相互兼任，但義學僧職之間可以互相兼任。從宋代經錄的記載來看，義學僧中最低者為證義，其次為綴文，最高者為筆受。初入譯場，多任證義之職。待熟習譯場工作之後，可升為綴文或筆受。

(1) 義學僧職常可相兼。如太平興國七年譯《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等三經時，「沙門常謹、法進筆受兼綴文」。⁶¹ 說明筆受與綴文可互相兼任。再如《參天台五臺山記》記錄熙寧年間譯場僧職：左街副僧錄同知教門公事譯經證義兼綴文文鑒大師賜紫用寧、右街副僧錄同知教門公事譯經證義兼綴文澄鑒大師賜紫文素。⁶² 說明證義與綴文也可兼任。

(2) 證義為譯場中最初職守，證義可升為綴文。如慧達、真顯，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七月、十月的譯經中，皆為證義，而在雍熙元年三月的譯經中，升為綴文。智遜，於太平興國八年七月、十月皆為證義，至雍熙元年三月，升為綴文。再如仁徹，最初在淳化五年至咸平元年，一直任證義一職，咸平元年十一月升任綴文。再如啟沖，從咸平六年開始任綴文，而在咸平五年十一月最初任證義一職。另如簡長，自天禧元年至天聖五年任綴文，而自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即入譯場任證義一職。說明綴文多由證義擢升，也說明譯場中證義為最低之職守。

⁵⁹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頁416-418。

⁶⁰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一，頁466-467。

⁶¹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頁415。

⁶²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頁284。

(3) 早期筆受可從綴文中擢任，但後期則多由譯經院培養的梵學僧充任。早期的筆受，如令遵、法定，在雍熙元年五月皆任綴文，其年九月二人開始任筆受。太平興國八年，譯場初興，天息災等人即請求太宗於譯經院培養梵學人才，至淳化年間，培養的梵學人才已漸能擔任譯場僧職，而筆受一職，在傳譯中十分重要，故自淳化年間開始，筆受一職就由譯經院培養的梵學僧惟淨、智江、致宗等人擔任。

綜上所考可知，宋代譯經僧侶進入譯場例經考察，初由薦舉，後改為薦舉加考試之形式。宋代譯場僧職之中可分梵學僧與義學僧兩類，梵學僧主要包括譯主、證梵文、證梵義；而義學僧主要包括筆受、綴文與證義。梵學僧職與義學僧職由於對語文知識掌握的不同，通常不能互相兼任。梵學僧僧職內部可以互相兼任，義學僧僧職內部也可互相兼任。義學僧職中，證義一職是最基本的僧職，證義僧可以升為綴文，而綴文僧也可以升為筆受。但在譯經後期，由於譯經院自己培養的梵學僧開始參與譯經，故筆受一職也由具有梵學知識的梵學僧充任。

（四）監譯之任用

宋代譯經之監譯例由宦官充任，據《祥符錄》《景祐錄》之記載，共有二十一人充任監譯：太平興國七年七月至八年三月由殿直劉素獨任；太平興國八年七月至雍熙二年五月，由殿頭高品王文壽與劉素並任；雍熙二年十月至三年二月，由王文壽、殿前承旨東慶並任；雍熙四年，由王文壽、殿頭高品楊繼詮、殿直張美三人並任；自端拱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由楊繼詮、張美二人並任；自至道三年十一月直至景德三年五月，由鄭守鈞一人獨任；景德三年十一月至四年五月，由殿頭高品周文質一人獨任；景德四年十一月至大中祥符元年，由內供奉官張廷訓一人獨任；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至五年五月，由羅自賓一人獨任；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至七年，由李懷信擔任；祥符七年至天禧元年五月，由李知和一人獨任；天禧元年十一月至三年，由衛承序一人獨任；天禧三年十一月由李希及獨任；天聖元年則由楊懷志、楊懷愍二人並任，其年十二月，由王熙素一人獨任；天聖二年十二月至五年四月，由王熙素、陳文一二人並任；天聖五年十二月至八年四月，由陳文一獨任；天聖八年十二月至明道元年十二月，由陳文一、黃元吉並任；明道二年，朱若水任同監院；景祐二年，裴湘監院，閻士良同監院。

另據金藏廣勝寺本《父子合集經》及《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神宗熙寧年間，李允恭、李舜舉、陳承禮都曾任監譯。綜而言之，宋代譯經任監譯可考者共

二十四人。考宋代譯場監譯，可得而言之者有如下數端：

1. 監譯之官職變化：宋代宦官機構以景德三年二月為界發生重要的調整與變化，即將原來的宦官機構改組為內侍省與入內侍省。⁶³ 入內侍省因更接近帝后，地位更為崇高。⁶⁴ 因譯場監譯皆由宦者充任，茲以景德三年為界，分別論述：

(1) 景德三年前，任監譯者有殿直（劉素、張美）、殿頭高品（王文壽、楊繼詮、鄭守鈞）；有殿前承旨（東慶）、供奉官（張美）；有右內率府副率（張美）、右監門衛率府率（張美）。據孫逢吉《職官分紀》載：太平興國四年，分內省屬官為入內殿頭高班、殿頭高品、殿頭小底三等；雍熙三年，增置入內供奉官、入內高班內品。⁶⁵ 形成供奉官、殿頭高班、殿頭高品、高班內品、殿頭小底五等。前期任監譯者多為殿頭高品，王文壽、楊繼詮、鄭守鈞皆以此職任監譯。殿直一官，前期情況雖不明，景德三年之後則為地位較低之宦官。同時，任殿直的劉素、張美在譯經進表中列名在殿頭高品王文壽、楊繼詮之下。從後期的情況對比與列名的位次來看，殿直應該是地位較低的宦官。雍熙三年，增置入內供奉官，張美端拱元年即以供奉官任監譯。右內率府率府率、副率與右監門衛率府率、副率皆為東宮導引儀仗、武衛官，「官存而無職司」。⁶⁶ 張美淳化五年至至道三年，以此二官職任監譯。殿前承旨，宋初為三班祇應使臣，為武官階官，雍熙二、三年東慶以此職任監譯。

(2) 景德三年，分內侍省與入內侍省之後，監譯類皆來自於入內侍省，地位頗為崇高。大中祥符二年之前，入內侍省設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屬官有供奉官、殿頭高班、殿頭高品、高班內品、黃門。祥符二年二月，改供奉官為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班為內侍殿頭，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⁶⁷ 形成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六等。⁶⁸

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二年，任監譯者有供奉官（張廷訓）、殿頭高品（鄭守鈞、周文質）、入內侍高班（羅自賓）。大中祥符二年之後，任監譯者有內侍

⁶³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職官三六，頁3888-3889。

⁶⁴ 《宋史》言：「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侍省。拱持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脫脫等，《宋史》卷一六六，頁3939。

⁶⁵ 孫逢吉，《職官分紀》（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二六，頁535-536。

⁶⁶ 脫脫等，《宋史》卷一六二，頁3826。

⁶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頁3889。

⁶⁸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頁3887。

高品（羅自賓、衛承序、楊懷志、王熙素、陳文一、黃元吉、朱若水）、內侍殿頭（羅自賓、李知和、李懷信、李希及、楊懷愍、黃元吉、陳文一）、西頭供奉官（黃元吉、陳文一）、供奉官（裴湘）、東頭供奉官（李舜舉、陳承禮）、副都知（李允恭）。

景德三年之後，任監譯之宦官品階有逐漸上升之趨勢。真宗朝多以內侍高品、內侍殿頭充任；仁宗朝任監譯之黃元吉、陳文一、裴湘皆為供奉官或西頭供奉官；而神宗朝任監譯之李舜舉、陳承禮皆為東頭供奉官，李允恭更為副都知。據《參天台五臺山記》之記載，李舜舉為「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監譯經」、⁶⁹ 陳承禮為「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權勾當傳法院」。⁷⁰ 知二人之差遣，皆以勾當御藥院之身分，兼任監譯、傳法院主事。勾當御藥職掌按驗秘方真偽、應時配置藥品、宣傳詔命、奉使督視，實為皇帝之親信。司馬光〈言王中正劄子〉言「御藥一職，最為親密」，⁷¹ 足見其地位之重要。⁷² 神宗朝以勾當御藥之李舜舉、陳承禮監譯，足見對譯經之重視。

2. 監譯或勾當譯經傳法院皆為差遣，故其在任期間官職有升降。如張美，雍熙四年至至道三年，一直任監譯一職，然其官職則有變化：雍熙四年為殿直，端拱元年之後為供奉官，至淳化五年，則升任為右內率府副率，至道三年又升任右監門率府率。再如羅自賓，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五年獨任監譯，其官職元年為入內內侍高班，二年為入內內侍高品，至四年則升為入內內侍殿頭。

3. 任監譯之宦官，多也參與過其他佛教事務。如王文壽，太平興國八年，天息災等上言選兩街童子習梵學，太宗「命高品王文壽集京城童行五百人，選得惟淨等十人」。⁷³ 而鄭守鈞則領導了譯經院之建設，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詔中使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⁷⁴ 再如張廷訓，太平興國五年至七年，於五臺山真容院修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⁷⁵ 大中祥符六年，趙安仁等編《大

⁶⁹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頁 558。

⁷⁰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頁 511。此處，原作「陳遂禮」，誤，據卷七（頁 596）改。

⁷¹ 司馬光，《傳家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三九，頁 510。

⁷² 梁天錫《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中「相關官司」一節，認為譯經院設有御藥院的派出機構，所依據的材料即《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李舜舉兼御藥之事。其實，此說不確，李舜舉之差遣兼勾當御藥院及監譯，一身二職，據此並不能說明傳法院內有御藥院的派出機構。

⁷³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 660。

⁷⁴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 658。

⁷⁵ 志磐，《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頁 1028；延一，《廣清涼傳》（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卷二，頁 1110。

中祥符法寶錄》，則由李知和勾當其事。⁷⁶ 天聖五年，惟淨等人編訂《天聖釋教總錄》，文末編刊人員有「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勾當印經院傳法院提點七寶塔臣陳文一」的署名，可知陳文一參與了《天聖釋教總錄》的修刊事宜。⁷⁷

再如，監譯黃元吉也參與了諸多佛教事務。天聖四年，在慈雲遵式的努力之下，天台教典編入大藏。⁷⁸ 天台教典入藏，黃元吉功不可沒。遵式撰〈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言：「遵式叨生台嶺，濫預桑門，剗心嘗習於斯宗，白首敢言於精業，志願此教編入大藏，俾率土咸益。天禧三年，會相國太原王公欽若出鎮錢唐，因以宿志聞于黃閣，遂許陳奏。事未果行，脩焉薨逝。至天聖紀號，幹當玉宸殿高班黃元吉以茲法利，上聞天聽。皇帝、皇太后體堯仁以覆物，奉佛囑以護法，爰擇梵侶，精校於真筌；旋繫竺墳，廣頒於秘藏。」⁷⁹ 可知天台教典入藏，遵式雖於天禧三年，即通過王欽若上奏其事，然未能成功。直至天聖元年，才通過黃元吉上奏，得以成就。另外，明道元年，沙門懷問再遊天竺，願為真宗皇帝建塔於天竺金剛座旁，當時為懷問出行作物資準備的也是黃元吉。「勾當傳法院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黃元吉寔被宸旨，錄賜三聖御製，仍俾尚方塗金於大衣，為賢劫千佛像，飾以金塗銀條，鈇御飛白書『佛法清淨』字於其裏，印以御前龍紐之文。并製塗金千佛幡六、塗金五百羅漢幡二以副之」。⁸⁰ 再如朱若水，景祐三年，王隨節錄《景德傳燈錄》的《傳燈玉英集》摹印頒行，朱若水總其事。⁸¹ 另據成尋之記載，熙寧六年大旱，神宗詔高僧祈雨，勾當其事者即為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兼後苑陳承禮。⁸²

由此可見，監譯之宦者，或領導譯經院之建設，或參與佛教經書之刊刻；或奏請佛典入藏，或塑佛像於五臺。可見他們多與佛教有相當之關係。宋代譯經人員的具體情況參表六（此表甚長，置於文後）。

⁷⁶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664。

⁷⁷ 惟淨等編，《天聖釋教總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72冊），卷末，頁947。

⁷⁸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載：（天聖四年），「內出天台智者科教經論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淨集左右街僧職、京城義學、文學沙門二十人同加詳定，編錄入藏」。卷一七，頁579。

⁷⁹ 遵式，《天竺別集》（收入《卍續藏》第10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卷一，頁264。

⁸⁰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八，頁586。

⁸¹ 王隨，《傳燈玉英集》（收入《中華大藏經》第72冊），卷一五，頁849。

⁸²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七，頁596-597。

四・皇室政府對譯經僧侶之獎顧

太平興國七年，譯場初開，經典譯成之後，「太宗皇帝臨幸譯筵，親加慰諭」。《祥符錄》言「自是釋門之選，咸重譯筵」。⁸³「釋門之選，咸重譯筵」，說明參與譯場對一個僧人的重要性。而參與譯場之僧侶，也多受朝廷之獎顧，或賜紫衣師號，或擢為僧官。

（一）賜紫衣師號

僧人紫衣之賜始於唐代，⁸⁴宋代譯場僧人受賜紫衣則始於證義沙門慧達。據《祥符錄》載，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詔賜證義沙門慧達紫衣」。然則，何以慧達成為譯場受賜第一人？太平興國七年，太宗皇帝臨幸譯筵，並命「京師義學沙門慧達、可瓌、善祐、法雲、智遜、惠溫、守巒、道真、寘顯、慧超等十人充證義」。慧達在十位證義中位列首位，極有可能因其年臘較長，故有次年紫衣之賜。此後，譯經沙門受賜紫衣、師號者甚多。

1. 賜紫衣師號之時間與數量

據《祥符錄》《景祐錄》之記載，太宗在位期間，賜紫衣師號較少，時間也相對不固定。自太平興國八年（983）至淳化三年（992），十年之間，賜紫衣師號僅五次，且數量不定：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賜紫衣一人；雍熙元年三月，賜紫衣三人；端拱元年十月，賜師號一人；端拱二年，賜紫衣一人；淳化三年十月，賜師號一人。

真宗繼位之後，譯經僧賜紫衣師號之時間與數量逐漸制度化。從咸平元年至天禧五年，除資料闕載及特殊情況外，每年皆有師號與紫衣之賜，時間均在十一月真宗誕辰承天節前。而賜紫衣師號之數量，也多為三人。仁宗在位期間，也是每年皆有紫衣師號之賜，時間多在四月仁宗誕辰乾元節前後，賞賜的數量也多為三人。仁宗天聖九年四月，「三藏沙門法護、惟淨上言：本院每歲誕聖節，例奏

⁸³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頁416。

⁸⁴ 贊寧撰，富世平點校，《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三「賜僧紫衣」條：「案《唐書》：則天朝有僧法朗等重譯《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為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法朗、薛懷義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高座講說。賜紫自此始也。」頁158-159。

紫衣、師號共三人。內一人，望許別擇高行僧奏舉，詔從之」。⁸⁵ 從此條材料可知兩點：首先，至少在仁宗年間，譯場僧人賜紫衣師號已成定制：即時間在皇帝誕節前後，賞賜的數量為三人。其次，天聖九年之後，由於法護、惟淨的請求，受賜三人中有一人於譯場外另選品行高潔者，故譯場受賜配額減為二人。

由此可知，真宗、仁宗朝，譯場僧侶賜紫衣師號漸成制度，即每年皇帝誕節頒賜，一般配額為三人，天聖九年之後，減為二人。

2. 賜紫衣、師號之標準

從《祥符錄》、《景祐錄》的記載來看，太宗在位期間，賜紫衣師號的標準比較嚴格，譯場的筆受、證義方可獲賜紫衣、師號。而真宗、仁宗在位期間，標準漸寬，譯場證義一般可獲師號之賜，而譯主、綴文、證義的門弟子即可獲賜紫衣。如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三年，施護六位弟子先後獲紫衣之賜。不僅譯主弟子可獲紫衣，證義的弟子也有紫衣之賜。如大中祥符七年，證義僧德雄二弟子澄珪、志真獲賜紫衣；大中祥符九年，證義僧行肇弟子澄誨、志璋也分別獲紫衣。而參與譯場時間稍久之證義，一般皆賜與師號；參與譯場時間甚短的證義僧，則賜紫衣。如天禧元年，證義僧重杲、志澄獲賜紫衣，二人皆於此年二月方參與譯場，列證義之位。再如善慈，天禧四年十一月充證義，天禧五年十一月即獲賜紫衣，兩年之後的天聖元年四月，即獲賜「演教大師」師號，而其弟子志淳則獲賜紫衣。

由此可見，真宗之後，譯場賜紫衣師號日漸頻繁，而賜與的標準也漸趨寬鬆：參與譯場的證義僧一般賜四字師號，而紫衣則頒賜於剛入譯場不久的證義僧，甚至譯主、證義僧的門弟子。

3. 職掌沙門受賜紫衣師號

「職掌僧」、「職掌沙門」之稱，僅見於宋代兩部經錄，其具體情況不甚明朗。然二錄中提到職掌僧、職掌沙門常與證義僧人同列，故應屬譯經院僧人。又參考世俗官制，職掌或職掌人為胥吏之稱號，即無官職但幹辦具體事務的吏人。如《宋會要》載「（尚書省）職掌有：都事、主事、令史、驅使官、散官五等」。⁸⁶ 又載：「（天禧）五年正月十七日，詔命官使臣犯贓，諸司職掌人吏因

⁸⁵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八，頁 585。

⁸⁶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頁 3095。

馮國棟

罪停職，累經赦宥，不該叙理。情輕者許於刑部及所在投狀，當議收叙。」⁸⁷ 由此可知，職掌為具體經辦事務之人。以此類推，所謂「職掌僧」或「職掌沙門」當為供職於譯經院，不從事經典譯傳，而從事雜務的僧人。

據兩部經錄記載，太宗年間，無職掌沙門受賜之記載。真宗、仁宗在位期間共有 21 位職掌沙門獲賜紫衣，4 人獲賜師號。真宗在位期間共有 12 人獲賜紫衣：澄寶、澄清（咸平二年），文雍（景德元年），志永（景德二年），文元、文涉（大中祥符二年），志拱、志江（大中祥符八年），志璘（天禧二年），志曦（天禧四年），澄諫、文詳（天禧五年）。仁宗在位期間共有 9 人獲賜紫衣：道月、志瑄（天聖二年），道廣、慧明（天聖三年），慧宣（天聖四年），慧妙（天聖五年），志嚴、慧光（天聖八年），慧住（明道元年）。真宗時，獲師號者 3 人，澄緒（咸平二年），澄寶（咸平四年），文雍（景德二年）。仁宗時，獲賜師號 1 人，文超（天聖六年）。職掌沙門多獲賜紫衣，獲師號者甚少，僅有 4 人，而且其中澄寶、文雍，皆是先獲紫衣之後，才獲得師號的。從此可知，職掌沙門在譯場中的地位相對不高。宋代譯經僧受賜紫衣師號見下表（表七）：

表七：宋代譯經僧賜紫衣、師號表

時間	受賜人	受賜人僧職、身分	所受紫衣、師號	資料來源
太平興國八年十月	慧達	證義	紫衣	《祥符錄》卷 3
雍熙元年三月	法定	筆受	紫衣	《祥符錄》卷 3
	令遵	筆受	紫衣	
	可瓌	證義	紫衣	
端拱元年十月	善祐	證義	演教大師	《祥符錄》卷 6
端拱二年	惟淨	筆受	紫衣	《祥符錄》卷 15
淳化三年十月	惟淨	筆受	光梵大師	《祥符錄》卷 15
咸平元年十一月	智江	筆受	宣密大師	《祥符錄》卷 10
	致宗	筆受	總持大師	
咸平二年十一月	道一	證義	紫衣	《祥符錄》卷 11
	懷哲	證義	辯才大師	
	澄寶	職掌僧	紫衣	
	澄清	職掌僧	紫衣	
	澄緒	職掌僧	廣慧大師	

⁸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頁 5101。

時間	受賜人	受賜人僧職、身分	所受紫衣、師號	資料來源
咸平三年十一月	句端	證義	慧辯大師	《祥符錄》卷 11
	紹琛	證義	宣法大師	
	守贊	證義	彰法大師	
咸平四年十一月	修靜	證義	紫衣	《祥符錄》卷 12
	道滿	證義	智藏大師	
	道一	證義	圓照大師	
	希晝	證義	慧日大師	
	澄寶	職掌僧	海慧大師	
景德元年十一月	修靜	證義	普智大師	《祥符錄》卷 12
	文雍	職掌僧	紫衣	
景德二年十一月	重珣	證義	法智大師	《祥符錄》卷 13
	文雍	職掌僧	智悟大師	
	志永	職掌僧	紫衣	
景德三年十一月	澄珠	梵學	演法大師	《祥符錄》卷 14
	文一	梵學	慧悟大師	
	瓊玉	證義	法慧大師	
	文祕	證義	崇教大師	
景德四年十一月	法護		傳梵大師	《祥符錄》卷 14
		施護弟子二人	紫衣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		施護弟子二人	紫衣	《祥符錄》卷 14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	文元	職掌僧	紫衣	《祥符錄》卷 15
	文涉	職掌僧	紫衣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志恭	施護弟子	紫衣	《祥符錄》卷 16
	道實		紫衣	
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	慧測	證義	演教大師	《祥符錄》卷 16
	簡長	證義	紫衣	
	志淵	施護弟子	紫衣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	簡長	證義	智印大師	《景祐錄》卷 16
	行肇	證義	紫衣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	澄珪	證義德雄弟子	紫衣	《景祐錄》卷 16
	志真		紫衣	

時間	受賜人	受賜人僧職、身分	所受紫衣、師號	資料來源
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自初	證義	紫衣	《景祐錄》卷 16
	志拱	職掌沙門	紫衣	
	志江	職掌沙門	紫衣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	行肇	證義	慧觀大師	《景祐錄》卷 16
	澄誨	行肇弟子	紫衣	
	志璋		紫衣	
天禧元年十一月	志緘	梵學	宣梵大師	《景祐錄》卷 16
	重杲	證義	紫衣	
	志澄	證義	紫衣	
天禧二年十一月	德雄	證義	明義大師	《景祐錄》卷 16
	義賢	證義	紫衣	
	志璘	職掌沙門	紫衣	
天禧三年十一月	智遠	證義	淨照大師	《景祐錄》卷 16
	慧珍	智遠弟子	紫衣	
	道成		紫衣	
天禧四年十一月	重杲	證義	法海大師	《景祐錄》卷 16
	慧燈	梵學	紫衣	
	志曦	職掌沙門	紫衣	
天禧五年十一月	善慈	證義	紫衣	《景祐錄》卷 16
	澄諫	職掌沙門	紫衣	
	文詳	職掌沙門	紫衣	
乾興元年四月	道昌	證義紹才弟子	紫衣	《景祐錄》卷 17
	慧通		紫衣	
天聖元年四月	令操	證義	寶印大師	《景祐錄》卷 17
	善慈	證義	演教大師	
	志淳	善慈弟子	紫衣	
天聖二年四月	惠真	證義	紫衣	《景祐錄》卷 17
	道月	職掌沙門	紫衣	
	志瑄	職掌沙門	紫衣	
天聖三年四月	紹才	證義	慧日大師	《景祐錄》卷 17
	道廣	職掌沙門	紫衣	
	慧明	職掌沙門	紫衣	

時間	受賜人	受賜人僧職、身分	所受紫衣、師號	資料來源
天聖三年十二月	遇榮	證義	紫衣	《景祐錄》卷 17
	法凝	證義	紫衣	
	紹源	證義	紫衣	
天聖四年三月	道隆	梵學沙門	智照大師	《景祐錄》卷 17
	璽玉	證義	紫衣	
	慧宣	職掌沙門	紫衣	
天聖五年四月	慧妙	職掌沙門	紫衣	《景祐錄》卷 17
	道深	慧聰弟子	紫衣	
天聖六年四月	文超	職掌沙門	圓教大師	《景祐錄》卷 17
	道詳	文超弟子	紫衣	
	慧本		紫衣	
天聖七年四月	慧燈	梵學沙門	明智大師	《景祐錄》卷 17
天聖八年四月	潛政	證義	紫衣	《景祐錄》卷 18
	志嚴	職掌沙門	紫衣	
	慧光	職掌沙門	紫衣	
	不動護	證梵義	紫衣、 流教大師	
天聖九年四月	志江	法護、惟淨弟子	廣慈大師	《景祐錄》卷 18
	惠妙		崇行大師	
明道元年四月	道月	施護、惟淨弟子	真性大師	《景祐錄》卷 18
	慧住	職掌沙門	紫衣	

（二）擢升僧官

除紫衣師號之頒賜外，如參與譯場較久，地位稍高，則有可能擢升為僧官，甚至直接管理左右街宗教事務。譯場僧侶擢升僧官之情況見下表（表八）：

表八：宋代譯經僧賜僧官表

時間	擢升人	擢升前僧職	擢升僧官官職	資料來源
淳化五年四月	慧達	綴文	右街鑒義	《祥符錄》卷 8
景德二年五月	仁徹	綴文	右街副僧錄	《祥符錄》卷 13
	繼隆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	
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修靜	綴文 ⁸⁸	右街講經首座	《景祐錄》卷 16
	重珣	證義	左街鑒義	
	啟沖	綴文	右街鑒義	
天禧四年六月	簡長	綴文	右街鑒義	《景祐錄》卷 16
天聖三年十一月	紹才	證義	右街鑒義	《景祐錄》卷 17
天聖五年九月	法凝	證義	左街鑒義	《景祐錄》卷 17
天聖八年五月	志純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	《景祐錄》卷 18
	鑒深	證義	左街鑒義	
	慧濤	證義	右街鑒義	

從上表可以看出：第一、自淳化五年（994）至天聖八年（1030）三十五年間，譯場僧人擢為僧官者僅十二人，較賜紫衣、師號為難，而其所代表之榮譽也較高，其中多人皆先有紫衣、師號之賜後獲僧官之擢。如慧達，太平興國八年獲紫衣之賜，淳化五年，升右街鑒義。修靜，咸平四年獲賜紫衣，景德元年獲賜「普智大師」四字師號，大中祥符八年，升為右街講經首座。簡長，大中祥符四年賜紫，六年獲「智印大師」師號，天禧四年，升右街鑒義。由此二人經歷也可知，譯場中僧侶受獎顧之序列為：賜紫衣——賜師號——擢僧官。

⁸⁸ 《祥符錄》卷一六載：大中祥符四年五月譯《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等經論時，修靜已與啟沖同任綴文之職。然而《景祐錄》卷一六卻載修靜於大中祥符八年以「證義沙門」身分升為「右街講經首座」。筆者認為，《祥符錄》之記載為確：第一、《祥符錄》載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十一月兩次奏進新經，皆稱修靜為「綴文」，而非「證義」。《景祐錄》載大中祥符五年、八年的兩次奏進新經，修靜也皆為「綴文」。如果說一次可能失誤，四次都失誤的可能性比較小；如果一書可能失誤，兩書皆失誤的可能就比較小。第二、上面所舉四次奏進新經，皆附有上進之表文，亦皆言修靜為「綴文」。上進皇帝的表文非常重要，不容有誤，數次上表，所言一致，所以修靜大中祥符八年為「綴文」一職當是事實。第三、言修靜在祥符八年任「證義」的僅有《景祐錄》卷一六。此卷為「嗣續興崇譯場詔令」，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歷年譯經的大事，是在前面十五卷基礎上形成的譯經史綱目，可以說是次生的史料，故而卷一六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更大。綜上所述，筆者取修靜大中祥符八年為綴文之說。下面的啟沖、簡長皆有前後記載任職不一的情況，基於同樣的原因，對於此數人擢任僧官時的任職，筆者皆不取《景祐錄》卷一六的記載。

第二、擢升之人，類皆多年供職譯場，真宗朝擢升僧官之前，受賜人多就綴文之職（如前所考，綴文多由證義僧升遷）。如慧達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起為證義，至雍熙元年三月升為綴文，淳化五年賜受右街鑒義。仁徹，自淳化五年起任證義，咸平元年十一月至景德三年五月任綴文，景德二年升為右街副僧錄。修靜，咸平四年至大中祥符三年任證義，祥符四年後任綴文，祥符八年升右街講經首座。啟沖，咸平五年十一月任證義，咸平六年任綴文直至天禧元年，也於祥符八年升僧官。簡長，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即入譯場任證義一職，自天禧元年至天聖五年任綴文，天禧四年升僧官。此五人在擢升僧官之前，皆任綴文一職。繼隆、重珣雖擢升之前為證義，但皆多年供職譯場。繼隆從咸平五年直至大中祥符二年，任證義七年。重珣，景德元年至大中祥符五年，任證義九年。仁宗年間，擢升標準漸寬，法凝天聖元年充證義，五年即升左街鑒義。志純、鑒深、慧濤三人，天聖五年始充證義，而天聖八年已擢為僧官，供職譯場僅四年時間。

（三）賜與官職

賜紫衣師號、擢升僧官，多是對義學僧職證義、綴文、筆受的賞顧，而對於譯主及同譯經之梵學僧，除紫衣師號之賜外，還有官職之封賞。雍熙二年十月，授譯主天息災、法天、施護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⁸⁹ 太宗詔曰：「以爾右街太平興國寺傳法院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賜紫天息災、傳教大師賜紫法天、傳法大師賜紫施護等並深悟真空，遠離絕域。能紹隆於佛事，爰演譯於經文，宜光被於朝恩，俾參榮於卿寺，可並特授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餘如故。」⁹⁰ 朝散大夫，宋前期為文散官二十九階之十二階，從五品下。試，表示試秩、試銜，無職事。鴻臚少卿，宋代初年無實除，但品在從四品下。由此可見，宋廷對主譯人員待遇頗為優厚。

端拱二年十月，又特授天息災（法賢）試光祿卿，法天、施護試鴻臚卿。詔曰：「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法賢、傳教大師法天、傳法大師施護等，並金河名胄，柰苑高流，夙探了義之宗，深樂同文之運，而自遠趨帝闕，光啟梵筵，繼白馬之遐蹤，暢青蓮之祕旨。……法賢可特授試光祿卿，法天、

⁸⁹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660。

⁹⁰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四，頁427-428。

馮國棟

施護可竝特授試鴻臚卿，餘如故。」⁹¹ 光祿卿，宋前期無職事，為文官遷轉官階，從三品。鴻臚卿，宋前期也為無職事官，從四品。咸平三年，天息災入寂；次年，法天入滅。咸平五年十一月，詔授施護試光祿卿。詔曰：「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賜紫施護，……可特授試光祿卿，依前傳法大師充西天譯經三藏散官如故。」⁹² 由此可知，宋前期譯經僧天息災、施護初授從四品下之鴻臚少卿，再遷從四品之鴻臚卿，終升為從三品試光祿卿。而法天初授試鴻臚少卿，後遷鴻臚卿。

真宗後期和仁宗時期，主持譯經者為法護與惟淨，二人也皆授除官階。大中祥符八年，特授法護、惟淨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詔曰：「傳法院同譯經西天傳梵大師賜紫法護、光梵大師賜紫惟淨，……並可特授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餘如故。」⁹³ 而在神宗時期譯經的日稱、惠賢在熙寧五年的職銜，也分別是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和試鴻臚少卿。⁹⁴

綜上所述，宋代諸帝對譯經事業頗為重視，特別對主譯之人尤為優賞。太宗、真宗時期的天息災、法天、施護，真宗、仁宗時期的法護、惟淨皆授除官階。而由試鴻臚少卿——試鴻臚卿——試光祿卿，此即譯主升遷之序次。

對於譯經僧之賞顧，除賜紫衣、師號，擢升僧官，授與官職外，尚有賜月俸、給假旅行，生病期間的御醫診視，死後的賜葬哀榮等。如咸平三年八月，法賢（天息災）入寂，「法賢初被疾，上遣中使護國醫霍炳等三人診視。及以不起聞，深嗟悼之，復遣中使馮仁俊監護襄事，所須官給」。⁹⁵ 景德三年七月，「筆受沙門惟淨以疾聞，上遣中使撫問，仍領太醫診視之，尋愈」。⁹⁶ 景德四年十一月，「筆受沙門致宗以疾聞于上，詔遣中使押翰林醫官診療」。⁹⁷ 天禧元年，「三藏沙門施護有疾，上遣中使監太醫霍炳、趙拱、左皓診視，是月二十六日以趣寂聞，上頗憫悼。遣入內殿頭王克讓監護葬事，所須官給。內出繒帛製法衣。葬日，左右街備威儀，賜謚曰『明悟』」。⁹⁸ 由此皆可見出，宋代諸帝對譯經僧人之眷顧。

⁹¹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七，頁442。

⁹²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二，頁473。

⁹³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六，頁571。

⁹⁴ 成尋，《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頁283。

⁹⁵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一，頁466。

⁹⁶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四，頁486。

⁹⁷ 楊億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四，頁488。

⁹⁸ 呂夷簡等，《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一六，頁573。

五·小結

宋代開設譯場以來，翻譯經典的同時，對譯場歷史資料的搜集也頗為用心，不僅編有《譯經院實錄》，還撰修了三部佛教目錄：即《大中祥符法寶錄》《天聖釋教總錄》與《景祐新修法寶錄》。此三部目錄詳細記述了宋代譯場的設立、譯經的程式、參與譯場的僧職、監譯與潤文的朝臣宦者以及譯經上進的章表奏議，為研究宋代譯經制度，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的譯經制度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本文以宋代三部經錄為基礎，結合相關史料，從宋代譯經院的建制、譯經原本的形制與語言、譯經的程式、皇室政府對譯經人員的賞顧幾方面對宋代譯經制度進行探析，力圖將佛教目錄與譯經歷史聯繫起來，展現更為細緻的歷史圖景。

（本文於民國一〇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收稿；一〇七年四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在本文的寫作與修改過程中，復旦大學劉震，上海外國語大學張煜，新加坡佛學院紀贊，浙江大學龔延明、謝繼勝諸先生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兩位匿名審稿人、複審人提出重要修改建議，特致謝忱。

表六：宋代譯經人員表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太平興國七年七月	天息災、法天、施護			常謹、法進	常謹、法進		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直劉素	
八年三月	天息災	法天	施護	清沼常謹	法進	惠溫、守巒、道真、真顯、慧超、慧達、可瓊	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直劉素	法雲、智遜、善祐
八年七月	法天	天息災	施護	清沼	常謹	惠溫、守巒、道真、真顯、智遜、法雲、慧超、可瓊、慧達、善祐	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建盛參詳
八年十月	施護	天息災、法護	法天	建盛	常謹、清沼	惠溫、守巒、道真、真顯、智遜、法雲、慧超、可瓊、慧達、善祐	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雍熙元年三月	天息災	法天	施護	清沼、法定、令遵	常謹、智遜、慧達、真顯	惠溫、守巒、道真、慧超、法雲、可瓊、善祐	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元年五月	法天	天息災	施護	清沼	令遵、法定、慧達、智遜	惠溫、守巒、道真、真顯、慧超、法雲、可瓊、善祐	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元年九月	施護		法天	清沼、令遵、法定	智遜、慧達、真顯	惠溫、守巒、道真、慧超、法雲、可瓊、善祐	兵部員外郎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二年五月	法天	天息災	施護	清沼、 令遵、 法定	真顯、 慧達	惠溫、守巒、 道真、智遜、 慧超、法雲、 可瓌、善祐	兵部員外郎 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直劉素	
二年十月	天息災	法天	施護	清沼、 令遵、 法定	智遜、 善祐、 慧達	惠溫、守巒、 道真、真顯、 慧超、法雲、 可瓌	禮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前承旨東慶	
三年二月	施護	天息災	法天	清沼、 令遵	慧達、 真顯	惠溫、守巒、 道真、智遜、 慧超、法雲、 可瓌、善祐	禮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殿前承旨東慶	
四年？月 ⁹⁹	法天	天息災	施護	清沼、 令遵	智遜、 慧達	惠溫、守巒、 道真、真顯、 慧超、可瓌、 善祐、歸省	禮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楊繼詮，殿直張美	
四年十月	天息災	法天	施護	清沼、 令遵	智遜、 慧達	惠溫、守巒、 道真、真顯、 慧超、可瓌、 善祐、歸省	禮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王文壽、楊繼詮，殿直張美	
端拱元年十月	施護、 法天			法進、 令遵	智遜	惠溫、守巒、 道真、慧超、 知則、善祐、 歸省、守遵	戶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楊繼詮、供奉官張美	
二年四月	施護			令遵	智遜	惠溫、守巒、 道真、慧超、 知則、善祐、 歸省、守遵	戶部郎中張洎	殿頭高品楊繼詮、供奉官張美	

⁹⁹ 有問號者，皆因底本殘闕，不可確定，下同。

馮國棟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二年十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 令遵	智遜、 慧達	惠溫、守巒、 慧超、知則、 守遵、顯丕、 雲勝	戶部郎中張 洎	殿頭高品楊 繼詮、供奉 官張美	
淳化元年 十月	法天	法賢	施護	清沼、 令遵、 惟淨	慧達	惠溫、守巒、 智遜、慧超、 知則、守遵、 歸省、雲勝	太僕少卿張 洎	殿頭高品楊 繼詮、供奉 官張美	
二年七月	施護	法賢	法天	清沼、 惟淨	慧達、 智遜	惠溫、守巒、 慧超、守遵、 道文、歸省、 雲勝、全永	太僕少卿張 洎	殿頭高品楊 繼詮、供奉 官張美	
二年十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 惟淨	智遜、 慧達	惠溫、守巒、 慧超、守遵、 道文、歸省、 雲勝、全永	右諫議大夫 張洎	殿頭高品楊 繼詮、供奉 官張美	
五年正月	法天	法賢	施護	清沼、 惟淨	智遜	惠溫、仁徹、 守貞、從志、 慧達、守遵、 道文、處圓、 雲勝	翰林學士中 書舍人張洎	右內率府副 率張美、殿 頭高品楊繼 詮	
五年四月	施護	法賢	法天	清沼、 惟淨	慧達、 智遜	惠溫、仁徹、 守貞、從志、 守遵、道文、 處圓、雲勝	翰林學士中 書舍人張洎	右內率府副 率張美、殿 頭高品楊繼 詮	
至道三年？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 惟淨、 智江、 致宗	智遜	仁徹、守貞、 從志、道文、 懷哲、雲勝、 句端、守贊、 道澄	給事中楊礪	右監門衛率 府率張美、 內供奉官楊 繼詮	

宋代譯經制度新考——以宋代三部經錄為中心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三年十一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智遜、道澄	仁徹、守貞、從志、道文、懷哲、雲勝、句端、守贊	翰林學士給事中楊礪	殿頭高品鄭守鈞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智遜、道澄	仁徹、守貞、從志、道文、雲勝、懷哲、句端、守贊	翰林學士給事中楊礪	殿頭高品鄭守鈞	
元年十一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智遜、仁徹	守貞、從志、道文、雲勝、懷哲、句端、守贊、道一	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	殿頭高品鄭守鈞	
二年十一月	法賢	法天	施護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仁徹、句端	守貞、從志、道文、雲勝、紹琛、懷哲、守贊、道一	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	殿頭高品鄭守鈞	
三年十一月	法天	施護	施護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仁徹、句端	守貞、從志、道文、雲勝、懷哲、紹琛、守贊、道一	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	殿頭高品鄭守鈞	
四年四月	施護	法天	法天	清沼、惟淨、智江、致宗	仁徹	守貞、道文、雲勝、紹琛、守贊、道滿、希晝、道一、修靜	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	殿頭高品鄭守鈞	
四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清沼、智江、致宗	仁徹、道滿	守貞、道文、雲勝、紹琛、守贊、希晝、道一、修靜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五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道滿	守貞、道文、守贊、希晝、道一、修靜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五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道滿	守貞、繼隆、啟沖、守贊、希晝、道一、修靜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咸平六年春至景德元年冬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道滿、啟沖	守貞、繼隆、希晝、道一、紹溥、修靜、智宣、重珣、文祕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景德二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啟沖	守貞、繼隆、希晝、道一、紹溥、修靜、重珣、文祕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二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啟沖	繼隆、希晝、道一、紹溥、修靜、瓊玉、重珣、文祕	給事中梁周翰	殿頭高品鄭守鈞	
三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清沼、致宗	仁徹、啟沖	繼隆、希晝、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殿頭高品鄭守鈞	
三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惟淨	清沼、致宗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殿頭高品周文質	
四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法護	清沼、致宗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殿頭高品周文質	
四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法護	清沼、致宗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內供奉官張廷訓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法護	清沼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當作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班羅自賓	
元年十一月	施護	惟淨	法護	清沼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班羅自賓	
二年五月？	施護	惟淨	法護	清沼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品羅自賓	
二年十一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沖、希晝	仁徹、繼隆、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品羅自賓	
三年五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沖、希晝	仁徹、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慧測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品羅自賓	
三年十一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沖、希晝	仁徹、道一、紹溥、修靜、重珣、瓊玉、文祕、慧測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品羅自賓	
四年五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沖、修靜	仁徹、道一、紹溥、重珣、瓊玉、文祕、慧測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高品羅自賓	
四年十一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沖、修靜	道一、紹溥、重珣、瓊玉、守晏、慧測、智臻、簡長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殿頭羅自賓	
以上據《祥符錄》									

馮國棟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	施護、法護、惟淨			清沼、澄珠、文一	啟玄（當作冲）、修靜	道一、紹溥、重珣、瓊玉、守晏、玄測、智臻、簡長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羅自寶	
五年十一月至八年六月	施護、法護、惟淨			澄珠、文一	修靜、啟冲	道一、紹溥、重珣、智臻、簡長、行肇、德雄、自初	兵部侍郎趙安仁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知和、李懷信	
九年十一月至天禧元年五月	施護、法護、惟淨			澄珠、文一	啟冲	道一、紹溥、智臻、簡長、行肇、德雄、自初、智遠、重杲	尚書右丞趙安仁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知和	
天禧元年十一月	施護、法護、惟淨			澄珠、文一	簡長	啟冲、道一、智臻、行肇、德雄、自初、智遠、重杲	尚書右丞趙安仁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衛承序	
天禧三年十一月至天聖元年四月	法護、惟淨			澄珠、文一	簡長、行肇	啟冲、道一、智臻、德雄、禪定、智遠、重杲、義賢、令操、善慈、紹才	譯經使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太子少師平章事丁謂、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晁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李維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希及、楊懷愍，入內高品楊懷志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	惟淨、法護			澄珠、文一	簡長	禪定、令操、善慈、紹才、惠真、遇榮、法凝、紹源、鑒玉	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李維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王熙素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二年十二月至五年四月	法護、惟淨			澄珠、文一	簡長	紹才、禪定、令操、善慈、惠真、遇榮、法凝、鑒玉	譯經使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欽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夏竦、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維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王熙素、陳文一	
五年十二月至八年四月	惟淨、法護			文一	簡長	法凝、禪定、令操、善慈、惠真、遇榮、鑒玉、志純、鑒深、清才、慧濤、潛政	樞密副使刑部侍郎夏竦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陳文一	
八年十二月至明道元年四月	法護、惟淨	不動護	忍吉祥	文一	遇榮	法凝、志純、鑒深、慧濤、善慈、潛政、清滿、善初、義崇、清才	樞密副使兵部侍郎夏竦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陳文一、黃元吉	
明道元年十二月起至？	法護			文一	遇榮	法凝、鑒深、慧濤、善慈、潛政、清滿、善初、義崇	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夏竦	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黃元吉、陳文一	
明道二年								朱若水同監院	
以上據《景祐錄》									
仁宗景祐元年二月至四年三月	法護、惟淨			文一	遇榮	法凝、鑒深、慧濤、善慈、潛政、清滿、善初、義崇、崇連、慧素、行存、鑒微	呂夷簡充譯經使兼潤文、王曙同潤文	供奉官黃元吉、裴湘、閻士良、朱若水	
以上據金藏廣勝寺本《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									

馮國棟

年份	譯主	證梵義	證梵文	筆受	綴文	證義	潤文	監譯	校勘及其他
英宗治平 元年至四年	日稱、 惠賢、 惠詢	天吉祥		惠明、 明遠	善初、 用寧	清振、清衍、 智孜、智聰、 智普、顯靜、 文素、潛政	韓琦充譯經 潤文使、歐陽 修同潤文		
以上據金藏廣勝寺本《諸法集要經》									
神宗熙寧 元年至四年	日稱、 惠賢、 惠詢	天吉祥		惠明、 明遠	用寧、 文素	清振、清衍、 智孜、智普、 顯靜、法秀、 可熙、超榮	富弼、曾公亮 充譯經潤文 使，趙抃、韓 絳、馮京同潤 文	入內內侍省 副都知李允 恭、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 供奉官李舜 舉	
以上據《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									
熙寧五年 至十年	日稱、 惠賢、 惠詢	天吉祥		明遠、 智寶	用寧、 文素	清振、清衍、 智孜、智普、 顯靜、法秀、 可熙、文正、 方信、惠倫	王安石充譯 經潤文使，馮 京、王珪同潤 文	入內內侍省 內東供奉官 勾當御藥院 李舜舉、入 內內侍省東 頭供奉官陳 承禮	
以上據金藏廣勝寺本《父子合集經》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隨，《傳燈玉英集》，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7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 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
- 司馬光，《傳家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成尋著，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呂夷簡等編，《景祐新修法寶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73 冊。
-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李濂，《汴京遺蹟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延一，《廣清涼傳》，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 夏竦，《文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7 冊。
- 孫逢吉，《職官分紀》，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徐松輯，郭聲波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惟淨等編，《天聖釋教總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72 冊。
- 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收入《大正藏》第 43 冊。
- 惠英，《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
- 楊億等編，《大中祥符法寶錄》，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73 冊。
- 遵式，《天竺別集》，收入《已續藏》第 10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贊寧撰，富世平點校，《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二・近人論著

五老舊侶

- 1981 〈佛教譯經制度考〉，張曼濤編，《佛典翻譯史論》，收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8 輯，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171-186。

史金波

- 1979 〈《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1：215-229。

馮國棟

曹仕邦

- 1978 〈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張曼濤，《佛典翻譯史論》，頁 186-282。

梁天錫

- 2003a 〈北宋漢譯佛經之類別、部卷、譯者及譯成時間考——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一〉，張其凡主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10 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頁 53-105。
- 2003b 《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北宋傳法院研究之二》，香港：志蓮淨苑。

陳璞、尹恆編

- 2013 《昆明元寧齋藏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

黃啟江

- 1997 〈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氏著，《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68-92。

藍吉富

- 2003 〈貝葉傳經——佛書的翻譯〉，氏著，《聽雨僧廬佛學雜集》，臺北：現代出版社，頁 84-106。

水野弘元、中村元等著，許洋主譯

- 1988 《印度的佛教》，臺北：法爾出版社。

羽溪了諦

- 1999 《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

Jan, Yün-hua (冉雲華)

- 1966 “Buddhis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Sung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s* 6.1: 24-42.

Salomon, Richard

- 1998 *Indian Epi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n, Tansen (沈丹森)

- 2002 “The Revival and Failure of Buddhist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ung Pao* 88.2: 27-80.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utra Transl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Centering on Three Buddhist Sutra Records

Guodong Fe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In the Song dynasty, three records of Buddhist sutras were compiled, namely the *Dazhong xiangfu fabao lu* (大中祥符法寶錄), *Tiansheng shijiao zonglu* (天聖釋教總錄) and *Jingyou xinxiu fabao lu* (景祐新修法寶錄), recording many aspects of the translation system for Buddhist sutras in the Song dynasty. Specifically, they recor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in the Song, the process of sutra translation, the official titles for monk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lation, the officials who supervised and edited the translated sutras, as well as the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dicating the submission of such translated sutras. These three records are precious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the sutra transl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or even the sutra transla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s a whole. Based on these three records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system by stud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institute, the format and language of translated sutras, the process of sutra translation and the royal rewards for thos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In this way,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esent a more detailed historical picture, linking the Buddhist records with the history of sutra translation. Moreover, this article presents several new ideas about the transl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order of seats for monk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the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monks in the translation institute, as well as the reward system.

Keywords: Song dynasty, sutra translation, monks' official titles, reward system